

## 日本第一本北京官话学习杂志——《清语和清文》初探

赵晓晖<sup>1</sup>

### 摘要

《清语和清文》是由日俄战争催生的日本第一本北京官话学习杂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至今尚无人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作者在日本所见的该杂志原本，详细介绍了该杂志的特点，并从思想倾向及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评述，指出了该杂志在语言教学及历史学上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日本 日俄战争 北京官话 学习杂志 《清语和清文》

### I. 引言

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编撰出版了一大批汉语官话教科书，而且出现了汉语学习杂志，这在世界汉语教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日本学者六角恒广《支那语学习杂志的消长》一文，介绍了从1897年到1945年间日本发行的与中国语学习及研究相关的杂志28种，明治末期的有7种。其中，《外国语学杂志》（1897），不仅仅是中国语学习和研究杂志，还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朝鲜语学习杂志。《台湾土语丛志》（1899）、《台湾语》（1901）、《台湾语学杂志》（1902）、《语友》（1904）、《语苑》（1908）五种都是以学习和研究“台湾语”即闽南语为主的杂志。这与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语言教育政策有关。六角恒广[5]认为，当时真正的学习和研究北京官话即所谓“清语”的杂志只有《清语和清文》一种。<sup>2</sup>

对于该杂志，目前在中日两国学术界能见到的只有六角恒广[7]的简短介绍如下：“伴直之助编辑，乃学习月刊。第1号于明治37年

（1904）年5月由东枝律书房发行。左侧装订，共34页，‘清语’用横书写式，从卷头开始；‘清文’因是时文，用纵书写式，从卷末开始。该杂志于日俄战争中发刊，旅顺海战的图画照片夹在其卷头，反映了战时的中国语热……‘清语’部分，每号刊载的是从《语言自述集》选出的单词和散语，也有从其他地方选的问答。‘清文’即时文，主要由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野德孝<sup>3</sup>负责，刊载报道日俄战争情况的中国报纸和上谕文，其中也有洗衣店的收据等，并有解说……作为专门的中国语学习杂志，《清语和清文》是我国最早的。”<sup>4</sup>但事实上，台湾语作为中国方言的一种，不是另一门外国语。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为：《清语和清文》是在日本刊行的最早的北京官话学习及研究杂志。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当时传教士办的一些杂志里面有介绍汉语的内容，但作为一本专门的汉语学习杂志，《清语和清文》恐怕也是最早的之一。

笔者有幸，于2014年在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见到了这本杂志，得以一睹这本日本最早的北京官话学习杂志的真容。

## II. 《清语和清文》的概况及思想倾向

### 1. 概况

《清语和清文》，日文原名为“清語卜清文”，也有人将其译为“清语与清文”。该杂志第一期于明治三十七年（即1904年）五月十五日发行，以后每月十五日发行。第一期还曾于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再版，京都外国语大学所收藏的本期即为再版本。该杂志初期定价为每册十钱，从第十一期起，改为每册十二钱。从第十五期至十九期，发行所由东枝律书房变更为裕邻馆编辑局，十六期封底注明东枝律书房为“大贩卖所”，十七至十九期，东枝律书房为“贩卖元”。但无论是东枝律书房还是裕邻馆编辑局，都位于京都。二十期发行所变更为经济杂志社，地址也由京都移至东京。每期的编辑兼发行者均为伴直之助，印刷者为川胜静三郎，印刷所为合资商报会社。京都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所藏为至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第二十期合订本，六角恒广所藏亦如是。至于移至东京二十期以后的情况，六角恒广先生说“情况不详”。但该杂志是伴随着日俄战争出现的，很多内容与日俄战争密切相关，随着该战争在1905年的结束，杂志似乎也走向了低潮。观其十九期和二十期，在内容上已成强弩之末，因此只发行了二十期亦未可知。

该杂志为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时有插页。如六角恒广先生所言，前半部为“清语”部分，从左至右，横排；后半部分为“清文”部分，从右至左，竖排。阅读时可以两头翻阅，但每册清语与清文的比例不尽相同。每期封面都是上部右侧为一轮朝日，象征日本，左上角有一只老鹰，向上飞腾并有几只羽毛落下，老鹰压住了“PETERSBURG”字样，象征俄国，两者之间写有“Far East”。从第五期开始，有时在太阳上还印上了“志贵奋于初，而尤励于终”或“松柏可以耐雪霜，明智可以涉难危”等格言警句，并且在封面顶端太阳上方印有“皇天庇佑，帝国万岁”，在老鹰上方印

有“天眼昭昭，报应甚速”等字样。中部为“清語卜清文”的杂志标题，下部为本期的目录，其中清语栏用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清文栏则用汉字。

关于该杂志的编者伴直之助，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不多。根据六角恒广先生在《日本中国语书志》中的说明，他分别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二月和三月出版了《华语跬步总译（前编）》和《华语跬步总译（全）》，但此人并非汉语界中的人物，在京都府商工会议所登记的档案中，他是一名实业家的面貌出现的。《清语和清文》第七号末尾的广告中透露，伴直之助曾是众议院议员，办杂志时的身份是“京都铁道取缔役兼支配人”。另外根据《清语和清文》中对话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他当时似乎还在京都有名的“清语讲习所”任职，由于工作繁忙，“隔天来一次”。可见他是一位既懂汉语，又具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的人。编者的这种身份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杂志的特点。

### 2. 思想倾向

由于该杂志创刊于日俄战争时期，应战时对于汉语的需求而诞生，因此该杂志的战争色彩很浓，在该杂志的封面下印有一行小字：“日本唯一杂志”，封三或封底同样的位置则注明：“送出征军人之最良杂志也”，可见该杂志的主要预设读者群为赴中国作战的军人，并且具有明显的扬日联清抑俄倾向。如六角恒广所述，该杂志的创刊号卷头即是旅顺海战的图画照片，并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了1904年3月10日与俄国进行“第四回旅顺海战”的经过，语气之中充满自豪外，在内容中还出现了一些“兵事小问答”之类的栏目，提供一些军事词句的发音和翻译。此外，在各卷之中，还不时插有当时日军作战的图片以及将领的照片，如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辽阳攻击中央军司令官野津陆军大将等，一些已经故去的将官照片在杂志中也有出现，例如杉野

兵曹长和被称为“军神”的广濑中佐等。在杂志中不时穿插的一些漫画和笑话，也无不体现了对于俄国的揶揄和嘲讽，而日本则总以正义的形象出现。例如一则配图漫画讲道：一只秃鹫饿得慌，看到了一只鸡，于是想去偷。在他抓住了鸡尾巴，鸡正在挣扎的时候，日先生出现了，日先生说道：“这个贪心不足的，我不知道那儿（哪儿）是个底儿了。我总得惩治它，这是天命。”于是出手相救，秃鹫哀嚎：“哎呀，被拿了。”鸡庆幸道：“幸亏救星来了，可以放心了。”而一直在袖手旁观的清先生则说：“果然，他做得好。”可以看出，这是以当时日人的思维在演绎日俄战争，与此类似的还有另一幅漫画，载第十号封三。画面上是一只大手，手背上写着“露国”（即俄国——作者注）几个指头分别伸向了波斯、印度、满清等地，代表日本的小人正在用一把锯锯断伸向满清的两个手指。该图的标题是：“俄国人的手头太长，总得剖开哪！”还有一则日汉对照的“戏画儿”《上梁不正下梁歪》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

1 太阳上来的时候儿。

2（俄国兵丁）哎呀不好了，那是倭国的旗号，倭兵又杀到了。

3（俄国将官）呸，你这蠢东西，也就乱叫起来。揉眼瞧瞧，那是太阳。

4（俄国兵丁）正是太阳么。

5（俄国将官）你们可以放心罢，若是倭旗，不等你说，我就先跑了！

这些内容，难以避免有美化日本之嫌，但也让人忍俊不禁。当时刊发这些照片和漫画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激发士气，但是今天看来，却给这本杂志添上了浓厚的历史气息。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对于俄国的谴责并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如第七号“教场问答”中“从京都到北京行路”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c：可不是么，从前有俄国的兵船，把英国商船打沉了的事情，现在他们两国的交涉还没清楚了，我想俄国现在再不敢那么乱做了。

b：那可保不住。俄国虽然也在文明国的种数之类，可是也做的事情，都是用野蛮的手段。

a：唉，不用说文明野蛮的话了，在我想那一个打败了，就是野蛮了。

b：您说的不错。

说话者的身份：c是店铺的伙计，b是中国商人，a是来中国的日本人。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实力才是衡量文明与野蛮的唯一标准，这是那时候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映。

众所周知，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府却被迫宣布“中立”，很多中国人深以为耻。但也有观点认为就整个世界局势而言是有其积极作用的，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8]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了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sup>5</sup>事实上，日本也利用中国人民仇恨俄国入侵的心理，把这场战争宣传为亚洲人反抗欧洲人、黄种人报复白种人的战争；还声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如同兄弟一样等等，这在本杂志中也有体现，如第八号“教场问答”“从京都到北京行路”中，中国人b谈到他的日本朋友丸山万扇坐的船佐渡丸被俄国兵船击沉遭难身死后，和日本人a有这样一段对话：

b：可惜，他为人很忠厚，就这么无名无利地死了，实在可伤可伤。

a: 真可怜,可是现在打仗的时候,贵国的官民,为国家的事情尽当然的义务,打仗死了的人很多、很多。

b: 可不是么,我想人生在世如梦一样,百岁千岁总是要死的,与其病死在家里,不如死在战场的地方,痛快而且有名誉。

a: 名论名论,拜服拜服!

似乎营造了一种中日两国同仇敌忾,共同对付侵略者的气氛。与之相关的还有对英国的态度,英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订英日同盟。第五号“日清英三国的人聚会岚山呼万岁”一文中有这样的对话:

(日) 兄弟们三国人在这儿聚会,实在奇遇了。我听说今儿个在岚山俱乐部有个讲习所的学生们,讲一讲中国话的法子,是很有趣儿。兄弟们一同去看看。

(清) 贵国和敝国同文同种,跟弟兄似的,兄弟欢喜的很。

(英) 兄弟们同盟之后,也算是弟兄了,兄弟爽快的了不得。

(日) 那么依二位说,兄弟们都是一家的人,就仿佛三国同盟的情形,咱们高呼三国大皇帝陛下的万岁为祝吧。

于是,对话在三人同声高呼“大日帝国大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大英帝国大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中结束。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给中国沉重的一击,于是很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在这本杂志也有反映,例如第八号“从京都到北京行路”中,日本人a与中国人b的对话:

a: 我听说山东出的蚕丝很多,可是染的颜色不好,所以销路不大多。

b: 可不是么,他们染的别的颜色还可以,只是白色染的顶不好。

a: 现在敝国有个人发明了漂白的法子,染的颜色很鲜明。

b: 那很好了,山东的蚕丝很便宜,若是用这漂白的法子,制造那个地方的蚕丝,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a: 那么地和您招股,在那儿开个漂白丝公司,好不好?

b: 我很愿意,不但开漂白丝公司,还是山东人不很明白养蚕的法子,每年出蚕不多,所以我还想教给他们养蚕的法子。

a: 怎么,他们不知道养蚕的法子?

b: 他们都是用老法子,所以害病死了的蚕很多,还是蚕吃的桑叶也不知道培养,有病的蚕和没病的蚕都搁在一块儿,不知道分开,所以彼此的传染,都不能长大了。

a: 这是最可惜的事情。中国有很多出产的东西,不知道用新法子,所以吃亏的了不得。

b: 是的,中国的地利的利益差不多都叫外国人占尽了,所以中国的年青有志的人都去日本国留学去了。

a: 他们去日本,都是学什么学问呢?

b: 都有。有学海陆军事的,有学法律政治的,有学工事的,有学理化的,有学医学的,大概凡有补益中国的事情,都有学了。

a: 他们来留学的费用,是自己的么?

b: 也有自己的,也有官给的。

a: 这么些个人学好了回国以后,中国的政府都可以信用他们么?

b: 大概都可以信用的。

日本“扬日联清抑俄”,学习汉语的策略有助于军事上的成功。在同期的“时文指南”栏目中,大野德孝选编了这样一篇文章:

#### 日俄胜负之一因

伦敦泰晤士报云日俄胜负之因,不一而足,中有一事,其事虽小而关系大。日军之至满洲者,大抵能自识华字,能自操华语。俄军则能之者甚鲜,必用华人为通译。而华人之愿为俄军通译者,往往皆下流无赖之徒。有不悦于俄则未必愿实告之。又习俄语不全,则虽欲告之而不能尽。故同是满洲之居民,在日军可为耳目之助者,在俄军适足闭塞其耳目而已。

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已经不可确考，但该杂志对来华日本军人的汉语教育无疑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由于这是一本民间杂志，这种“扬日联清抑俄”的倾向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民间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迎合了当时日本军人的需要，使得该杂志成为日俄战争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 III. “清语”部分的特点

#### 1. 《语言自述集》的影响

该部分受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的影响甚大。从第一期开始，该杂志就从“发音”、“单词”和“文法”三个方面介绍汉语，这可以说是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直接影响。这与我们今天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时的三个侧面“语音”、“词汇”和“语法”完全一致。至于汉字，本来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构成难点，因此本杂志的编者也就略去不讲了。在注音方面，《清语和清文》在“发音谱表”中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和日语假名对照的方式，在文中则采用了“威妥玛式”。在词汇上，基本上采用分类学习的方式，从数目词开始，每期分月名、时辰、天文、天气等进行介绍，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注音和日语翻译解释说明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不单是介绍词汇，而是和“散语”结合起来，并涉及名词、形容词等，在介绍时注意创造具体语境，特别是和“会话入门”结合起来，让读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文法上，将文法的介绍与“会话入门”结合起来，在学习简单会话的同时了解汉语的句子结构，并辟有专章介绍了一些语法项目。

#### 2. 鲜明的时代特色

六角恒广先生也指出，《清语和清文》刊载的除了从《语言自述集》选出的单词和散语，还有从其他地方选的问答。这其中不排除编者

伴直之助自编的问答练习。恰恰是这部分联系当时生活实际的问答，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广阔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画卷，具有语言学和历史学上的双重意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多期都设有“教场问答”一栏，围绕发生在“清语讲习所”的一些话题，或师生、或同学、或朋友，一问一答，妙趣横生，在完成对话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那时候进行汉语教学的实际例子。如第七号中出现的“京都清语讲习所指引”：

a: 老兄一向少见。

b: 久违久违。

a: 你上哪儿去？

b: 我到京都清语讲习所，学清国话去。

a: 京都清语讲习所在哪儿？

b: 柳马场街，押胡同。

a: 离七条火车站有多远？

b: 离七条火车站大概十七町。

a: 东洋车也好走么？

b: 东洋车也可以走，电汽车也可以走。

a: 东洋车的车钱是多少？

b: 大概十四钱。

a: 坐电汽车的时候，怎么样呢？

b: 做电汽车的时候，到二条寺町的拐弯儿的地方下车，往西去五町的光景，再往南转弯，这是柳马场街押胡同。

a: 从七条火车站到二条寺町，电汽车的车钱是多少？

b: 五钱。

a: 那学堂里的房子，讲究不讲究？

b: 那不很讲究。

a: 讲师姓甚么？

b: 任先生。

a: 他是清国人么？

b: 是北京人。

a: 还有日本讲师没有？

b: 有，工藤先生，而且干事伴先生隔一天来一回。

a: 那学堂里用什么书？

b: 用华语跬步和华语跬步的翻译。

a: 还有随便会话么?

b: 一天念书, 一天说随便话, 就是现在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念书……礼拜二和礼拜四说话, 礼拜六学时文。

a: 天天甚么时候开功课么?

b: 早起从九点钟到十一点钟, 晚上从七点钟到九点钟。

a: 那学堂的规矩怎么样呢?

b: 没有甚么为难的。

a: 月谢是多少?

b: 每月一块钱。

a: 还要束脩不要?

b: 那不要。

a: 学生有多少?

b: 现在有六十来个人。

b: 他们白天都有事情很忙, 到了晚上都很乏了, 可是他们是很用工可感。

a: 若是六十个人, 人人都努力的用工哪, 就比六十万人还强哪。

b: 不错、不错。

a: 这几天我打算上那边学堂去。

b: 请来请来。

a: 请您说给我们有益的话。

b: 那儿的话呢!

a: 这几天必去。

b: 再见再见。

本段似乎是在练习问路、询价等功能, 但又透露了清语讲习所的大量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教学场所、师生比例、教材使用、课程安排、收费情况等, 几乎可以当作史料来看待。为了验证这段语料的真实性, 笔者在京都曾经按照文中所指引, 重走了从京都站到清语讲习所这段路, 清语讲习所虽然早已不存, 但文中提到的地名、方向、距离, 无一不确, 证明这段对话所言不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种对话可能与当下的口语稍异, 甚至有一些错误, 但它却不是那种干巴巴、徒具正确的语言形式而没有思想内容的对话, 而是有血

有肉, 栩栩如生, “若是六十个人, 人人都努力的用工哪, 就比六十万人还强哪”一句, 饱含思想感情。

在对话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所学语言和文化的态度, 例如从第六号到第八号的“教场问答”有“从京都到北京行路问答”, 用对话体的形式, 记录了一个学生从京都乘坐各种当时的交通工具, 经朝鲜仁川来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其中第八号中讲到他和一位中国客人谈论他带着的一本《北京风土记》:

a: 我带着有北京风土记。

b: 咱们一块儿看, 好不好?

b: 是汉文么? 是和文么?

a: 汉文也有, 翻译的和文也有。

a: 我前年去北京的时候, 看见的事情和这书里记的事情, 都不一样。所以古人说了: 耳听不如眼见, 实在真不错。

b: 是的。不论哪一国书里记的事情, 总有点铺张。

a: 那是免不了的。

《北京风土记》, 可能就是《北京风土编》, 是当时在日的汉语教师张廷彦编的一本有名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读物<sup>6</sup>。两人的对话, 既点明了这本书当时的流行程度, 又对其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又如快到朝鲜时, 两人说道:

b: 您会说高丽话么?

a: 我明白一点儿, 可是说的不能连串。

b: 我听说高丽说话的法子和贵国一样。

a: 是的, 敝国人在高丽作买卖的都能说高丽话。

b: 为难为难, 可是没有仿佛贵国话为难。

a: 不错, 清国话没有一定的文法, 所以为难。

日语和朝鲜语可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 两种语言在语法上近似, 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 与日语朝鲜语在语法上完全不同。当时的人们, 未必有这些理论知识, 但是在日常生活和交流学习中, 已经有了自发的语言对比意识, 也反映到了杂志中的对话里。

### 3. 精巧的构思与专用汉语的萌芽

在对话的设计方面，也可以看出杂志的编者颇费了一番心思。例如第七号中“从申到营船上和中国人交谈”一段中，一个日本人在从上海前往营口的途中与中国人相识，一路攀谈，互相进行自我介绍，彬彬有礼，又介绍了各自的生意之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的敝国话，在哪儿学的？”

“是在上海，请的是贵国京里的先生。”

“啊，您学了几年了？”

“我学了有半个多年了。”

“学了半年，您说的这么巧，足见您的天分高了！”

日本人的汉语虽然很好，但还是犯了“半个多年”这样的错误，但并不影响交际的进行；中国人在听懂了他的回答后，也没有特意纠正，而是紧接着说：“学了半年，您说的这么巧，足见您的天分高了！”在纠正对方的同时，给予对方高度的赞扬，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尽在其中。第八号“教场问答”“从京都到北京行路”中中国人提到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姓“丸山”，名字叫“万扇”，在俄国兵船把他坐的船打沉了之后，遭难死了。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个名字绝不是随便起的，编者在这里有意识地练习学习者的汉语声调。又如第六号同样的“从京都到北京行路”对话中，日本人提到他在仁川的朋友是做武官的，叫“加藤清正”。事实上，加藤清正是日本熊本城的建立者，是江户时期的武将和大名。选用这个名字，一方面和武官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传达日本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文中特意将姓“加藤”和名“清正”分开，进行了两个回合的问答，可能是想锻炼学习者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因为“加”和“藤”是一次不送气和送气的对比，“清”和“正”又是一次。可见，在些细节部分都体现着编者的苦心。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汉语教科书中，已经出现了后来所谓的商务汉语的萌芽，在这份杂志

中也不例外：或设有“官商吐属”一栏，即“官商会话”；或模仿在中国经商的商人介绍在中国的见闻；或为“支那之店铺类”，模拟不同的场景下中国人做生意的情形，覆盖面广，对话内容充满生活气息。事实上，在该杂志第一期的封二，编者伴直之助已经明言：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将进入“满洲”进行商务活动，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学习中国语，编辑本杂志的目的就在此。并且特别注明作此“自序”的时间是“明治甲辰五月初一我军占领九连城日”，署名为“清香庵主人伴直之助谨白”。

在教授实用汉语的同时，该杂志也在进行人文培养，这同样可以看作是编者精巧构思的一部分。如在大量的对话中，不时穿插着当时人们对于时局的看法，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以及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等，在地道自然的语言中，透露出大量的信息，读之令人感叹不已。所有问答，在难字上都注有“威妥玛式”拼音，旁边有日文翻译，以利读者自学。除了语言，该杂志还有一些别的价值，如在第二号至第五号还设有“时文音读”栏目，完整记录了当时的“日俄交涉始末”，注音并附有日文注释，编者当时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加强口语发音练习，但今天看来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IV. “清文”部分的特点

### 1. 多文体输入，特别注重应用文的学习

如前所述，六角恒广先生指出：“《清语和清文》杂志中，清文部分即时文，主要由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野德孝负责，刊载报道日俄战争情况的中国报纸和上谕文，其中也有洗衣店的收据等，并有解说……”事实上，不光是时文，清文部分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当时中日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就其栏目来说，主要有“支那时文研究”、“支那时文讲习”、“时文指南”、“支那最近之文件”、“时文杂记”、“支那之美文”等，特别注重书信等那时候实用性很强的应用

文。例如由关口隆正撰文，分不同期介绍了“抬头法与敬避式的话”、“敬启与台安的话”、“尊称与自称的话”等，用日语向读者详细讲述书信写法。有时候，编者伴直之助直接就把他本人的一些书信往来刊登出来，以供读者学习。如当时在日本从事教学的著名中文教师张廷彦与本杂志编者伴直之助有往来的一封信，编者直接将其刊登在了第九期杂志上：伴先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由清水君闻悉大名，并嘱改正日本唯一杂志清语清文，弟已改毕一号，交清水君转呈。其中错误无多。后又接到第八号一册，其中错误较多。是否速为删改？亦或俟覆印时再为删改？祈示知可也。

昨又收到华语跬步总译三十部，亦未知系赠弟者，或由弟处转交他人者，亦祈函示为盼。至覆印杂志，欲列贱名一事，弟不敢辞。惟望将其本按删寄下，略加删改为妥。特此布达，顺颂著安，并贺年禧。

弟 张廷彦 顿首  
十二月廿五日

从第十期开始，果然在“清语”部分的开头，用括号注明“张先生校阅”。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伴直之助将它刊登在杂志上，不但给读者提供了地道的语料模板，增强了该杂志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也给今天的我们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该杂志在第三号中专门有“商贾通用信函式”一栏，分入乡看货、定办货物、请友叙谈、催送定货、请友发电几个环节，介绍了商务信函的写法并附有解释说明，随后将信封格式的写法也一板一眼地予以例示介绍。在“支那最近之文件”中，常常登上至皇帝谕旨、邦交书信，下至工资收据、托友买卖的委托信函等，当然也包括六角恒广先生说的“洗衣店的收据”等，给我们展示了当时鲜活的汉语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而且通过介绍，让学生把握有关汉语文体的写作技能，提高写作水平。各种

类型的时文、尺牍教学内容，还有各种借据、收条等，几乎包括了当时常见的各种应用文，这其实也是现代学者所强调的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文教学。

## 2. 兼顾各种语体，古文时文并重

如前所述，《清语和清文》这份杂志是将语和文分开排列的，这也体现了汉语教学的一个特点，即汉语是一种书面语与口语距离相当大的语言。当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尚未发生，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分野很大，而且书面语中又有时文和古文的区别，因此日人也具有很强的语体意识。传统上日本的汉学教育是重视书面语忽视口语，书面语中重视古文忽视时文。进入明治时期，有了一些转变。在前引“清语”部分的对话中，也提到“清语讲习所”的课程安排是星期一三五念书，二四说话，六学习时文。

“清文”部分的重头戏是由大野德孝主持的“支那时文研究”或“时文指南”，他的思想对于本杂志的选编必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野德孝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在第十一号和十二号上连载的《高等时文读本自序》一文中。在该文中，大野德孝说：

“吾欲将时文加于汉文教科也，旧且久已。而试行之，实验之，确认其效果亦有年矣。故于明治三十六年刊行支那时文读本，寻于清语与清文（月刊册子名）每号开载时文指南，今又著高等时文读本，其意专在为汉文教科创开一生面，使新日本青年无复习蹈儒家克来之迂阔，耆老美人之愤眊也。”<sup>7</sup>

因此，大野德孝充满激情地指出二十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一个“活动世界”：

“苟以二十世纪青年自许者，岂可无奋励一番，打破恋古守旧之陋习之勇决乎？宜须烂烂开活眼繙活书吃了活汉文之活趣味，以活步于活世界也。抑如彼扶殖清国，经营满韩，则非我国天职乎？然而，后来任于完成此天职者，果是谁也？一念到此，则时文要紧不辩而明矣。



虽然，余亦固知时文基于古文，故非欲全废古文，专用时文也。切欲矫补偏读古文不顾时文之弊套也而已。若夫于高等普通教育古文时文兼授并教，则古文之尚简洁与时文之悉委曲彼是对照、旧新比较，相发明焉，相会心焉。而其进步之速，实有堪惊者也。而其所需于行之时间，则现行规定而足矣，不必要增加之也。”

这篇序文暴露了当时部分日本人的野心，但也必须承认，大野德孝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于古文时文的看法，是相当有见地的，甚至较之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某些看法，更为成熟和全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清语和清文》在选编“清文”时，必然体现出时文和古文并重的局面，既有当时报章上的时评，又有古朴典雅的经典，既有科普性的小品，还有译自西文的汉文。

作为典型的文言和白话的对照，该杂志从第十四号开始连载《长发贼反乱记》，记录太平天国故事，并附有解说，在第一回的目录中特别注明“清国俗语言文一致”。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号又在“支那之美文”栏目中连载军使张文成的文言文，让读者领略汉语不同语体。大野德孝对于古文和时文的看法，《清语和清文》一杂志对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处理，对于今天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体教学，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 3. 关注时代前沿，内容丰富多彩

作为一本杂志，该杂志在教授汉语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非常注意趣味性。例如第十六号的“时文指南”下有几篇小文章，题目分别是《考察太平洋之底》、《太平洋为月之产出地》、《美国二十五总统之格言》，其他各期的选目也是丰富多彩，由此可见编者兴趣之广，日人当时的眼光之宽。编者还加以日汉对照或者注释，大野德孝不时发表阐释性文章，用日语向读者进行详尽的说明。

另外在“清文”栏中，还刊登有当时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近况，例如第十

一号载有《俄国人对于满洲语和满洲文字的研究》，第十三号又登出了《德人的清语研究》。

“时文杂记”一栏，更是将当时重要的时文，翻译成日语，以对照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内容涉及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极为丰富，今天看来，颇具史料价值。

不可忽视的是，本杂志的一些栏目编花也颇具匠心，例如当时中韩两国的铁路情况、《三字经》的英译、汉日对照的《上海繁昌记》，介绍中国各地的小品文等，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为本杂志增色不少。

## V. 《清语和清文》的价值与影响

伴直之助并非汉语专业人才，他在全球局势剧烈变化的二十世纪初，在日俄战争的大背景下，敏锐地抓住了市场的需求，打破了传统的北京官话教学思维模式，提供了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志，将现代传播手段应用于北京官话教学，对拓展北京官话教学时空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意义。西方现代语言学教学理论与方法渗透在《清语和清文》中，学校教学和期刊杂志教学的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引入社会，呼应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迅捷发展态势，是日本北京官话教学面向社会开放的一种语言传播之路，体现了语言教育的新观念。它以北京官话教学为出发点，以研究中国文化为重心，以实现其某些“国家语言政治”愿望为终极目的。研究它，更能够认识到日本北京官话教学在这一个时期的基本功用。

《清语和清文》作为日本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官话杂志，其优点是明显的。它是一本语言学习杂志，其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是毋庸置疑的。除了语言要素方面外，该杂志还特别注重技能教学，尤其注重语言的交际功能，突出会话实践。在注重会话的同时，《清语和清文》也没有忽视阅读的教学。该杂志兼顾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学习，在学习书面语时，又做到了古文和时文并重，可以说涵盖了当时汉语语

体的方方面面。在文体方面，也编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以供阅读之用。而且通过文体的介绍，让学生把握有关汉语文体的写作技能，提高写作水平，读写结合，以阅读促写作的特点十分突出。

与语言教学并重的，还有对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的重视和中日文化自觉的对比。在介绍中国文化时，既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又有专门的文化知识介绍。前者如在第十期“中国之店铺”的对话中涉及到各种中国特有的货币（大小元宝、方槽、中锭、镲子、羊肚银等），则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明；后者如十一期中辟出专章介绍在中国过新年的风俗，特别指出“皇上也很拘束，一点儿不能逍遥快乐的”，本期还分“新年开市的事情”，“在北京过新年”“在上海迎春的话”几个专题进行介绍，在介绍到北京的新年时饶有兴趣地讲到了在琉璃厂买砚台被骗的事情；在介绍上海“打春”的习俗时结尾特别强调“要知道中国的风俗，也不可不看这样的事儿啊”，生活气息浓厚，跨文化色彩明显，令读者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间，回味无穷。仔细梳理本杂志，发现编者在无意识中，对于文化的几个层面，如器物文化层、制度文化层、风俗文化层和心理文化层，都有所涉及，而且在解释词汇及社会现象、发表议论时，或由编者出面，或借对话中人物之口，时常与日本文化进行对比，都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体现了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除了语言文化教学之外，今天我们再次翻检这本杂志，发现它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学术价值，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研究的价值。明治末期中国语学习杂志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传播形式，是日本北京官话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清语和清文》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窗口，我们可以窥见日本明治末期北京官话教育史的许多内容，这是其他文献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其次，是对汉语史研究的价值。本杂志采用威妥玛拼音标音，真实记录下了当时北京的语音系统。除了北京音之外，第

九、第十一期还有日清英对照的“上海语阶梯”专门栏目，第十二期又介绍了辽东音，并与日语进行了有意识的对比，在第十四号上还刊出了一篇文章，即由白尾义夫撰写的《北京官话与辽东土语的差异》，所有这些，无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词汇方面，杂志中出现的一些词语现在还在使用，一些已经用另外的词语替换，还有一些已经从北京官话中退出了，这给研究清末北京官话词汇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再次，也是更重要的，由于本杂志是一本“清国语言研究”和“清国文章研究”并重的刊物，对中国晚清历史与文化及当时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关系以及当时的世界形势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犹如一座宝矿，本文只是挂一漏万，对它深入挖掘，定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当然，由于本杂志是日本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官话学习杂志，不可避免也有很多缺点，最主要的就是系统性不强。这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前文所述的文法的讲解虎头蛇尾，栏目的设置有一定的随意性，部分内容，如有些“戏画儿”和发音谱表多次出现，最后在连载《长发贼反乱记》中甚至出现了篇章参差错误的重大失误。另外，在部分章节如张廷彦的信中所言，还存在着一些舛误，后来由于有了张廷彦的校正，错误减少了一些。但是考虑到这是一本杂志，而非普通的汉语教科书，它在照顾时效性的同时，可能对系统性有所忽略。

《清语和清文》对明治后期乃至大正、昭和前期北京官话教学期刊杂志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两年后创刊的《支那语学》杂志就是一例。《支那语学》未见六角恒广先生提及，由李无未和许彬彬[9]发现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据他们的研究，《支那语学》月刊，创刊号于明治四十年（1907）六月五日由泉水信太郎编辑、田中庆太郎发行，印刷者是本间季勇，发行所为支那语学研究会，1908年5月终刊，只印了12期。其内容在《清语和清文》中大部分都有所涉及，这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再后

来如创刊于1941年1月的《支那语杂志》，与《支那语学》相比，虽然办刊理念有所变化，栏目设置更加细化，但形式上的安排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虽然李无未和许彬彬认为就成熟度和科学性来讲，《支那语学》已经远远超过《清语和清文》，但《清语和清文》的开创之功，毕竟功不可没，值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加以深入研究。

### 注释\*

<sup>1</sup>工作单位：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8年校级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KJRH18A004。

<sup>2</sup>六角恒广：《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遗》，不二出版社，2001年，第249-273页。

<sup>3</sup>大野德孝（1852-1931），1875年毕业于东京师范学校小学师范科，后担任大阪师范学校一等训导，1877年华族学校成立时任教授兼主事。1879年调至大阪专门学校，教授修身、汉文。1886年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第一课长，1888年任三重县师范学校校长兼学科长，1890年转至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任总务主任兼汉文教授等职。1911年因病辞职，同年被分配至铁道院西部铁道管理局，后被任命为高知县立第一中学校长。1915年退休返回京都。晚年担任武德会监事兼常议员，一德会评议员。大野德孝是二战前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在汉语文教学方面卓有成绩。

<sup>4</sup>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王顺洪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sup>5</sup>[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3页。

<sup>6</sup>据李无未《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刊行》：《北京风土编》，张廷彦著，1898年11月由善邻书院发行。张廷彦

（1864—1929），字少培，号云鹤，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1897年，被聘为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中国语教师，后又任东京帝国大学等大学中国语教师。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

<sup>7</sup>作者原注：克来美人二事，是余前著时文读本自序中引例矣。其大要曰：某儒家奉官命翻译外交文书，中有“主仁克来”四字，口只诵之，心不会之，强释曰：行政以仁为主，则庶民子来之意矣。后质之洋学书生，谁思主是君主，仁克来其名尔，古罗伊也。又有某耆老，盖宿儒也，偶见支那新报中有“美人可畏”之四文字，辄将美人误解美妇人，绝不知美人即米国之谓。而此四字是说米国力发展膨胀，有可畏可惊者也。

### \*参考文献

- [1] 威妥玛：《语言自述集》，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2] 陈珊珊：《〈亚细亚言语集〉与十九世纪日本中国语教育》，《汉语学习》2005年第6期。
- [3] 陈珊珊：《〈语言自述集〉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 [4]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不二出版社，1991-1998年。
- [5]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遗》，不二出版社，2001年。
- [6]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 [7]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王顺洪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9] 李无未 许彬彬:《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 [10] 李无未:《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刊行》,《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